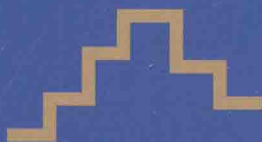


国际关系中的 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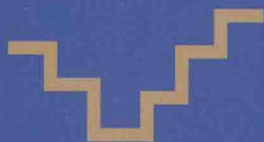
理论与实践

王建伟 陈定定 刘丰

— 主编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cast



Theory and Practic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关系中的 预测

理论与实践

王建伟 陈定定 刘丰

—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中的预测:理论与实践/王建伟,陈定定,
刘丰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1379-4

I. ①国… II. ①王… ②陈… ③刘… III. ①国际关
系未来学-文集 IV. ①D8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374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张笑天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国际关系中的预测:理论与实践

王建伟 陈定定 刘 丰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171,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79-4/D·2261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陈定定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政府与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芳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漆海霞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师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牛长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肖恩·奥布莱恩(Sean P. O'Brien)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研究员

斯蒂夫·伯恩斯坦(Steven Bernstein)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教授

詹尼斯·格罗斯·斯坦因(Janice Gross Stein)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

斯蒂芬·韦伯(Steven Weber)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

序 言

王建伟

在社会科学乃至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任务——描述、解释、预测——中,预测显然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受到质疑,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理论都未能正确把握国际关系演变的趋势,从而预测冷战的终结和国际关系格局因此产生的体系性变化。后冷战时期西方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判断和预测也没有太多傲人的成就。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红极一时,但是事实证明历史远远没有终结,最后连福山本人也不得不出来修正他的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及对世界政治会带来影响,但是在文明冲突对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各大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产生的影响上也未提供太多先见之明。近年来国际重大事件的发生如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最近乌克兰的变局,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也是事后诸葛亮的解读,而不是见微知著、未雨绸缪的预测。

学者对国际关系预测困难的成因已经有很多的分析。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际社会对民族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调控相对国内行为者而言比较薄弱,从而增加了各种国际角色行为的不可预测性。第二,国际关系中各个层次上的各种变量太多,它们之间的互动较为复杂,很难建立起相对简约、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且偶然因素总是存在,从而增加了预测的难度。第三,虽然国际关系中的主体是民族国家,但是在外交决策和执行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人类的社会行为和其自然行为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作为外交决策者的国家

领导人尽管一般而言比常人更为理性,从而更有预测性,但是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受到各种人性弱点的制约。领导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可以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和结果。第四,国际关系不是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无法复制事件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历史也不会重复。因此以通常建立在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来预测将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五,国际关系学者对资料和数据的控制和占有与其他学科相比也有更大的难度。例如外交决策的过程和考虑、有关国家安全的资料一般都属于国家机密,即使在美国这样相对开放的国家也要几十年后才能解密。研究者通常情况下也很少有机会接触高层决策者以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想法。这些都使得国际关系中的预测往往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坚实的基础。

虽然国际关系中的预测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但是无论从学科建设和政策研究的层面来看都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角度来看,如果国际关系学只能从事事后的描述和解释,而不能在前者的基础上找到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具备一定的事先预测能力,说到底它还是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从政策层面来讲,国家的决策者需要具有预测功能的理论和方法来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政策,从容应对可能发生的趋势和变局。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由于国际体系各种力量的彼此消长和权力分配仍然处于过渡期,造成所谓“结构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预测既变得更为困难,也变得更有紧迫性。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面对日益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如何能够正确判断国际形势,预测未来世界大势,从而形成防患于未然,应对各种可能挑战的外交定力,也需要加强对国际关系预测的研究。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和挫折,中外国关系学者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国际关系预测的理论和方法。本书就是这种探讨的一个成果。它搜集了中外学者的9篇论文,从各个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预测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具体来讲,这些论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对国际关系预测的研究:(1)对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预

测进行概念辨析,澄清科学预测与一般预言之间的差异;(2)评估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方面的表现,将预测作为理论评估和发展的一种合理指标;(3)比较学界在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各种有关国际格局走势的预测;(4)介绍和评析几种主要的预测方法,比如情景分析、数量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危机预警系统等;(5)反思国际关系学界在预测问题上取得的进展与不足,探索提升预测可靠性和准确性的路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认为具有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等主要功能,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理论的预测功能缺乏足够的重视。陈定定、刘丰在《认真对待预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预测》一文中通过考察科学哲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既有成果后发现,理论预测可以作为评估和发展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并能为修正和完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有价值的知识。虽然理论预测是否准确并不能作为评判理论解释力强弱的唯一标准,但是在满足理论所设定的解释范围和条件之内,一种指涉经验现实的理论也应该可以做出相对具体且明确的预测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格局或国家行为的发展趋势。自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围绕国际格局变迁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转型等问题展开了诸多争论,通过对这些成果进行初步评估,作者发现几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都有待提升,准确的预测需要综合不同理论的核心要素,以更加全面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发现规律来认识世界,并利用规律进行预测从而更好地指导一国的外交活动。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的预测》一文中,李芳芳通过研究发现,预测不仅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国内外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预测实践中也经常存在着一个“预测困境”,即专家学者们往往热衷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但他们的预测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预测失误频频出现。李芳芳首先界定了预测的基本概念,然后在分析预测的可

行性基础上,通过建立预测系统模型图来阐述预测的基本原理,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法对减少预测失误的途径进行分析探讨。

冯绍雷在《冷战后的国际预测研究:观点、特征与问题》中指出,冷战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变化进行分析和把握的现实需求日益增多,这促使国际预测成为学界一门紧缺而重要的知识门类。在预测国际形势未来走向的问题上,作者分别分析了基于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历史终结论”、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周期性霸权论”、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转移论”、基于体制转型对未来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影响论”以及“文明冲突论”和“大国兴衰论”等,认为国际预测的发展基本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思潮变迁以及各种理论流派的争论。²¹ 21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一批相当有分量且由集体创作的国际预测作品开始出现,同时也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其工作理念、组织方式和研究手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国际预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要建立一门具有自己严密逻辑与范畴体系的学科知识,其基础显然还有待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国际预测研究的“多样性”和“进步性”两者间的平衡在理论和观念上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影响其预测水平的提升。

在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下,国际结构的分析和预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和基础。宋伟在《国际结构的分析与预测——现有方法与实证的反思》一文中回顾和分析了现有的方法和实证成果,指出在现有的研究中,常识化分析法和数量化分析法是构成研究国家实力的主要方法。基于这两种方法,学者们利用惯性定律的原理对国际结构进行短期预测,但这两种分析方法都不能、也不便于准确地界定国家实力,因而利用惯性定律原理进行的短期预测并不准确。作者发现,由于没有确定长时间里影响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这些方法还无法对国际结构的长期发展做出较为精准的预测。

在国际关系预测领域,目前较多文献集中于经验预测或者回归模型预测。而在计量经济学中,时间序列(time series)预测方法是比较前沿的预测方法。漆海霞在《时间序列分析在国际关系预测中的应

用——以中法关系为例》中将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引入国际关系预测领域,以中法关系为例,建立了 ARIMA 模型。根据模型检验,中法关系属于非平稳序列,也就是说中法关系变化不是水平波动,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趋势。通过经验事实的检验表明,文中对双边关系的预测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阎学通在《预测双边关系的经验》一文中结合其近年来主持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预测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反思了影响预测准确性的因素。他指出,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预测研究都是从经验预测向科学预测发展的。国际关系中的双边关系预测受到时间、政府能力、问题性质、实力对比和首脑会晤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预测严重失误的最主要原因是信息的缺乏,同时缺少对官方信息的怀疑、忽视决策者的性格、忽视决策者的个人利益、主观意愿的干扰等因素也会导致预测偏差。预测的准确率与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有较强的相关性,在加强定量衡量双边关系有效性和总结预测双边关系经验的基础上可以提高定量预测双边关系的能力。

牛长振的《国际关系中的情景分析研究》一文试图借鉴情景分析这一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阐述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适用性。情景分析是指对未来有多种可能的发展状况的描述,它不是要精确地预测未来,而是让人们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机会和挑战,以达到“不管未来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已做好准备”的境界。情景在基本假设、基本内涵、主要用途和研究重点等方面都不同于预测,它具有改变心智模式、进行系统思考以及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等特点,有利于应对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弥补简约化理论解释与预测功能的不足。

军事专家和其他决策者都需要预先对即将发生的危机进行预警,以便他们能制定有效的缓和危机计划、动员资源以及与国外同行协调反应。在过去 40 年间,美国政府大力投资于建立从分析角度讲站得住脚并且能够处理和厘清大量实时或准实时信息的危机预报系统的一些尝试。在《危机预警与决策支持:当前的方法和对以后研究的思考》—

文中,肖恩·奥布莱恩介绍了美国军方开发综合危机预警系统的最新尝试。尽管综合危机预警系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数据和方法,但是迄今为止的经验反映出当前定量方法在解决与现实世界有关的社会科学问题时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性研究路径——利用计算机进行社会科学实验,这种路径不仅能够改进危机预警和反应,还能更广泛地革新社会科学知识形成、评估和应用的方式。

出于理论和经验上的原因,对于预测理论的追求建立在对于物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错误类比之上。不过,斯蒂夫·伯恩斯坦、理查德·内德·勒博、詹尼斯·格罗斯·斯坦因和斯蒂芬·韦伯在《上帝抛给物理学的问题更简单——让社会科学适应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一文中指出,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演化生物学是更有意义的类比对象。几位作者从“硬”和“软”两个版本比较了物理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类比存在的缺陷,主张社会现象并不适宜做出确定性的、单线条的预测,而是应该采用情景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影响全球和地区局势发展的主导力量和因素。作者们试图提供几种可能的未来情景,认为种族冲突加剧、核武器扩散和安全的私有化是国际关系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

希望这些论文能够在国内学界引起对国际关系中预测问题的兴趣,并促发有志者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目 录

- 1 序言 王建伟
- 1 认真对待预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预测 陈定定 刘 丰
- 20 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的预测 李芳芳
- 39 冷战后的国际预测研究：观点、特征与问题 冯绍雷
- 55 国际结构的分析与预测
——现有方法与实证的反思 宋 伟
- 73 时间序列分析在国际关系预测中的应用
——以中法关系为例 漆海霞
- 88 预测双边关系的经验 阎学通
- 116 国际关系中的情景分析研究 牛长振
- 138 危机预警与决策支持：
当前的方法和对以后研究的思考 肖恩·奥布莱恩
- 163 上帝抛给物理学的问题更简单
——让社会科学适应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 斯蒂夫·伯恩斯坦等

认真对待预测：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预测*

陈定定 刘 丰

在国际关系学界,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到冷战终结,因而它们的解释力大打折扣。¹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仍会以“未能预测冷战终结”为由批判甚至否定某些理论。公允而论,我们并不能用是否预测到冷战的终结来评判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甚至是社会科学理论)的优劣,因为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中的绝大多数理论都没有预测到这一结果,而且预测这一事件本身就显然超出了绝大多数理论研究的范围和适用条件——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目标和功能在于解释规律性而非反常性现象。不过,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误解引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即预测在理论评价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

不夸张地说,任何一部有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教科书在论及理论的功能时,都会介绍理论可以并且应该提供解释和预测。不过,学者们一般会重点强调理论的解释功能,对预测功能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理论是否需要对现实问题做出明确的预测?理论预测与理论解释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理论的预测在理论评估中究竟占

* 本文写作直接得益于在“全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Global Junior Scholar's Forum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的讨论,感谢蒲晓宇、漆海霞、王学东、陈拯、汪卫华、曾凯、孙学峰、谭林茂、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等诸位同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感谢蒲晓宇对本文初稿提供的书面评论和建议。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据多大的分量?为了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本文的写作大致分为四部分:首先,我们将从科学哲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哲学的视角考察围绕预测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地位而展开的争论。其次,我们将对理论预测的类型、范围和评价标准进行探讨,由此提出能够得到学界基本认可的定义和评价标准。再次,我们将对几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分支在一些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所做出的预测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在何种情况适用于预测研究。最后,我们将提出未来推进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研究的可能方向和领域。

预测功能与理论评估

科学理论有四项基本功能和目的,分别是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一般而言,描述是构建理论的起点,当理论家为了构造理论而对现实进行简化时,他们已经在对现实进行简化式描述。解释被普遍认为是科学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现实世界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无疑是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其他两项功能实现好坏的基础。预测与指导是高度相关的,因为指导需要在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判的基础上采取应对措施。当然,在不同学科领域,上述四项功能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实现程度是存在差异的,而且同一领域的不同学者对这些功能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权衡取舍。总体上看,学术界对理论解释的强调最多,对其赋予的权重最重,即便是在以系统性、科学性研究著称的美国学界,有关国际关系预测的系统研究也显得非常匮乏。

理论解释与理论预测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一种好的理论是否需要做出明确的预测?理论预测错误是否应成为抛弃某种理论的理由?鉴于这些问题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辩论,我们首先有必要考察科学哲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哲学上的相关论述,因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相关争论不过是科学哲学争论的延伸和体现。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主张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尤其是持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者通常会支持理论预测,而后实证主义的学者通常反对理论需要做出预测。20世纪科学哲学大多因循实证主义的模式,即通过

推导假说、观察预测事件与现实是否吻合来检验理论。而后实证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世界的客观性以及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没有客观、中立和确定的标准来评判人们对当下的认识,更不必说对未来的预测。

当然,并非所有认可科学研究的学者都支持将预测作为评判理论好坏的标准,科学共同体内部对解释和预测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解释与预测是高度相关的,预测力本身就是解释力的重要方面,因为理论预期与现实对照是理论评估的基本标准。众所周知,证伪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将预测事实与理论对照的结果作为证伪一个理论的最重要标准(即判决性试验)。波普尔认为,科学假说的评价完全在于它所包含的预测,预言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验证科学理论:“如果我们有一种可独立检验而又为真的理论,它就会为我们提供成功的预测(并且仅提供成功的预测)。”²明确主张解释与预测高度相关的科学哲学家是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他提出了著名的“解释与预测同构论”(explanation/prediction symmetry thesis)。按照亨普尔的观点,解释与预测在逻辑结构上是相同的,在满足一定的逻辑条件和经验条件的情况下,解释性语句暗含了待解释事件的发生。³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修正素朴证伪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将能否预言新颖事实(novel facts)作为判断研究纲领是进步还是退步的重要指标。如果一种理论修正或改进不能产生有关新事实的预测,或者预测的新事实没有得到经验上的证实,都会被视为特设性修正。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解释与预测是可以区分开来的,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做出解释,而不需要考虑其预测功能。明确反对将解释与预测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哲学观是从批判卡尔·亨普尔的“同构论”开始的。在提出解释与预测同构论之后不久,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就对这一命题提出质疑。⁵一些学者指出,进化论没有做出预测,但是能够对物种起源和进化做出很好的解释。当然,在科学史上,仍然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进化论实际上也做出了一定的预测。⁶近年来,一些坚持实在

论的社会科学哲学家主张社会科学的核心是因果机制，声称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的解释，都意味着超越单纯证明所研究的现象是某些观察到的规律性的表现，揭示其深层以及通常不可见的机制，由此否定了实证主义科学观所持的规律性立场。例如，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主张科学理论的关键在于揭示因果机制，因果解释与预测是可以明确区分开来的，并且指出“有时无法预测也能解释，有时我们无法解释也能预测。的确，在许多情况下，同一个理论可以让我们做这两件事，但我认为在社会科学中，这是例外而非惯例”⁷。他也指出，一种理论预测失败可能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即无法产生关于人们在一种给定情形中会做什么的特定预测；其二是非理性(irrationality)，即人们可能未能遵循其预测。⁸

在国际关系领域，上述两种观点的对立同样存在。一些坚持科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理论的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不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比如，尽管戴维·辛格(David Signer)承认“预测并不是理论的主要作用，一切科学研究最基本的作用是解释”，但他也认为“一种强大的解释性理论……在预测未来方面的功能要远远强于那种建立在对共变(co-variation)现象的观察或事后陈述基础上的理论”。⁹詹姆斯·李·雷伊(James Lee Ray)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则认为，预测在国际关系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与未来的结果进行对照就好比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检验，能够使人们对不同理论的种种解释所具有的启发性价值进行一一比对并做出评判：那些做出预测与实际完全不符的理论与那些做出预测已得到验证或者未遭否定的理论相比较，其价值当然要低，因为如果根据某种理论的基本公设而推断出来的预测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那就说明这些基本公设以及由此所做出的解释都是有问题的。此外，相对于理论的解释功能而言，预测是不可事后修改、补充来自圆其说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理论的通病。¹⁰

当然，也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对理论预测的效力提出了怀疑。比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这位推动国际政治理论科学化的

理论大师认为,尽管理论具有解释和预测双重功能,¹¹但是判断一种好的理论的标准在于其能够“准确地解释,而不是预测”¹²。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则系统论述了国际关系中的预测难题,认为预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1)社会科学家能够依靠的知识储备是有限的,而只有少数规律的有效性是没有争议的;(2)极少有单个因素能够决定世界政治;(3)对国际政治的学习可以充当自我否定的预言(self-denying prophecy);(4)除非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完全由外部环境决定,否则公众和政治家的选择有相当大的空间;(5)当今世界局势是史无前例的;(6)当要素紧密联系时,体系一部分的变化会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并形成反馈回路。¹³

从上文的梳理来看,无论是在科学哲学界还是在国际关系学界,无论是持实证主义立场还是持实在论立场的学者,实际上都不反对做出理论预测,但两者对预测是不是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理论能否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以及预测失误是否构成了对理论的致命性打击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科学哲学上的差异反映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深层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弥合的。从学术实践和现实需要出发,本文对理论解释与理论预测之间的关系持开放的、折中的、调和的立场。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理论是科学的,是以规律为解释对象的,那么以理论的假定作为前提,以假设作为命题,必然推导出具有一定预测性的结论。理论不仅可以做出预测,而且在学术实践中也在进行预测,因而能够成为知识探究的一个合理组成部分。当然,由于理论本身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和简化,仅考虑少数变量,预测失误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理论的预测功能,否认理论预测的准确性在其评价中所具有的位置。国际关系预测不仅可以成为评价某种理论适用性的标准之一,也是连接理论与政策的桥梁。国际关系中的很多决策是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制定的,正因为此,就需要一些方法和技术来预测未来的可能情形和发展趋势,来满足人们认识和控制不确定性的需要。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指出,“通过对特定时期起核心作用的因果力量进行识别,理论提供出一幅关于世界的

图画，由此让政策制订者更好地认识到他们遇事所处的广阔背景”¹⁴。

预测的定义和评价

在对各种理论的预测功能进行评价前，我们有必要明确预测的定义。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预测通常是指“一个指涉未来的论断……它可能是概率性、决定性或条件性的”¹⁵。在国际关系中，预测可以简单定义为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事件、状态或趋势的明确论断。

具体而言，预测在时间上所指涉的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与此同时，预测的内容反映的是国际关系的事件、状态或趋势。人们在做出预测时，既可以针对具体的外交政策事件，例如预测美国是否会介入一场国际危机；也可以针对地区性或全球性国际体系的状态，例如预测今后二十年国际结构是单极结构还是多极结构；还可以针对全球发展趋势，例如预测未来国家间关系是合作大于冲突还是冲突大于合作。从具体的指涉对象来看，预测既可以针对结构(structure)的特征，也可以针对能动者(agent)的行为。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均势理论为例，一部分均势理论家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特征，他们预测均势是一种周而复始、频繁出现的状态；另一部分理论家则关注国家的行为和政策，他们预测一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倾向于采取发展军备或结盟等制衡行为，以纠正实力失衡的局面。¹⁶尽管体系状态与国家行为具有高度相关性，但是从分析对象来看，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

从上文所述的定义看，研究者做出的预测必须是明确的。在此，预测的明确性只是指预测内容不能是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以便我们能够用事实证据来检验所做出的预测是否正确。比如，一位研究亚洲货币合作的学者认为，东亚国家在2020年可能就单一货币达成一致，也可能达不成一致，因此“亚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预测就不符合预测的明确性要求，因为它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无法检验其正确与否；或者说这样的预测永远正确，因为它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学术实践中，尤其是在理论著述中，大部分学者对预测持谨慎的